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

中国社会道德发展研究报告

——家教与家庭家风建设研究报告

2016

CHINESE SOCIAL MORALITY
DEVELOPMENT RESEARCH REPORT
RESEARCH REPORT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FAMILY CUSTOMS

主 编 葛晨虹 陈延斌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

中国社会道德发展研究报告

——家教与家庭家风建设研究报告

2016

CHINESE SOCIAL MORALITY
DEVELOPMENT RESEARCH REPORT
RESEARCH REPORT OF FAMILY EDUCATION AND
FAMILY CUSTOMS

主 编 葛晨虹 陈延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社会道德发展研究报告. 2016——家教与家庭家风建设研究报告/葛晨虹, 陈延斌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12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
ISBN 978-7-300-26589-6

I. ①中… II. ①葛… III. ①道德发展-研究报告-中国-2016 ②家庭道德-研究报告-中国 IV. ①B8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2915 号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
中国社会道德发展研究报告 2016

——家教与家庭家风建设研究报告

主 编 葛晨虹 陈延斌

Zhongguo Shehui Daode Fazhan Yanjiu Baogao 2016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85 mm×26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11.25 插页 1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04 000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编委会

主任 陈雨露

副主任 冯惠玲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中	王孝群	毛基业	冯惠玲	刘大椿
杜 鹏	李路路	杨伟国	杨瑞龙	吴晓求
陈雨露	陈 岳	郝立新	贺耀敏	袁 卫
倪 宁	郭庆旺	董克用	韩大元	温铁军

总序

陈雨露

当前中国的各类研究报告层出不穷，种类繁多，写法各异，成百舸争流、各领风骚之势。中国人民大学经过精心组织、整合设计，隆重推出由人大学者协同编撰的“研究报告系列”。这一系列主要是应用对策型研究报告，集中推出的本意在于，直面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开展动态分析和评估预测，建言献策于咨政与学术。

“学术领先、内容原创、关注时事、咨政助企”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的基本定位与功能。研究报告是一种科研成果载体，它承载了人大学者立足创新，致力于建设学术高地和咨询智库的学术责任和社会关怀；研究报告是一种研究模式，它以相关领域指标和统计数据为基础，评估现状，预测未来，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研究报告还是一种学术品牌，它持续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焦点和重大战略问题，以扎实有力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党和政府以及企业的计划、决策，服务于专门领域的研究，并以其专题性、周期性和翔实性赢得读者的识别与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有自己的学术积淀和学术思考。我校素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注重学术研究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曾陆续推出若干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譬如自2002年始，我们组织跨学科课题组研究编写的《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中国人文社会发展研究报告》，紧密联系和真实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和人文社会发展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十年不辍，近年又推出《中国法律发展报告》等，与前三种合称为“四大报告”。此外还有一些散在的不同学科的专题研究报告也连续多年，在学界和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研究报告都是观察分析、评估预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其中既有客观数据和事例，又有深度分析和战略预测，兼具实证性、前瞻性和学术性。我们把这些研究报告整合起来，与人民大学出版资源相结合，再做新的策划、征集、遴选，形成了这个“研究报告系列”，以期放大

规模效应，扩展社会服务功能。这个系列是开放的，未来会依情势有所增减，使其动态成长。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还具有关注学科建设、强化育人功能、推进协同创新等多重意义。作为连续性出版物，研究报告可以成为本学科学者展示、交流学术成果的平台。编写一部好的研究报告，通常需要集结力量，精诚携手，合作者随报告之连续而成为稳定团队，亦可增益学科实力。研究报告立足于丰厚素材，常常动员学生参与，可使他们在系统研究中得到学术训练，增长才干。此外，面向社会实践的研究报告必然要与政府、企业保持密切联系，关注社会的状况与需要，从而带动高校与行业企业、政府、学界以及国外科研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收“协同创新”之效。

为适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系列”在出版纸质版本的同时将开发相应的文献数据库，形成丰富的数字资源，借助知识管理工具实现信息关联和知识挖掘，方便网络查询和跨专题检索，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适用的增值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系列”是我们在整合科研力量，促进成果转化方面的新探索，我们将紧扣时代脉搏，敏锐捕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热点、焦点问题，力争使每一种研究报告和整个系列都成为精品，都适应读者需要，从而铸造高质量的学术品牌、形成核心学术价值，更好地担当学术服务社会的职责。

目录

报告一：中国社会治理视域下的家庭建设	1
一、坐标位置：现代化治理体系中的家庭建设地位	1
二、历史方位：“家”在中国历史及传统文化中的特有地位	4
三、中国传统家庭模式及现代家庭应有功能	8
四、家庭与家庭文化建设的着力点	12
报告二：当前我国家风建设现状调研分析	21
一、优良家风对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价值	22
二、当前我国家庭教育与家风建设的现状与成就	25
三、家教与家风建设中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30
四、各地家风建设促党风政风民风建设实践经验及其借鉴	33
五、以家风建设促进党风政风民风建设路径探索	42
报告三：当代中国家庭教育状况的考察与分析	46
一、家庭教育的内涵与意义	46
二、中国当前家庭教育状况	51
三、加强和改进家庭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67
报告四：中国家庭建设中的家训文化	76
一、家训文化的地位作用	76
二、中国家训文化源远流长	81
三、当代家训文化建设结硕果	86
四、传统家训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89
报告五：家庭建设中的孝道问题研究	93
一、家庭建设与孝道	93
二、家庭孝道的社会现状	95

三、孝道问题及其实质、成因与影响	99
四、构建孝道传承和弘扬的应对机制	103
五、结束语	107
报告六：养老问题与和谐家庭建设	109
一、我国养老困境的表现及其对和谐家庭建设的影响	109
二、我国养老困境的成因	114
三、解决我国养老困境以及构建和谐家庭的策略	117
报告七：农民工家庭问题与伦理关怀	122
一、农民工就业状况与家庭境况	123
二、农民工家庭子女教育与“留守儿童”问题	130
三、农民工家庭生活中的“留守老人”问题	136
四、农民工婚姻生活及“临时夫妻”问题	140
五、农民工家庭问题及对策研究	144
报告八：国外家庭教育与家庭建设经验借鉴	151
一、东方国家的家庭教育与家庭建设经验	151
二、西方国家的家庭教育与家庭建设经验	156
三、国外家庭教育举措值得借鉴的几个特点	167
四、结语	170
后 记	171

报告一：中国社会治理视域下的家庭建设

家庭建设是当下国家、社会重点强调的建设任务之一。家庭建设同时也是中国当下多维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维。党和国家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对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改革要求，是一种思路方略高度的新提法。概念微变后面体现的是我们党和国家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验的总结，表明中国对社会发展规律、国家发展和治理有了更自觉的认识把握。“家”在中国社会有着不同于其他民族、国家的独特历史根源和社会地位，与此相关，中国也才形成了浓厚的以“家”为核心与基础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家和万事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是中国独特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所形成的一种文化表达。在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培育中，家风家教和家庭建设已经得到了国家社会的极大重视。

一、坐标位置：现代化治理体系中的家庭建设地位

“家”是中国社会的历史起点，也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元点所在，还是中国人的心灵归宿与精神依托所在。“家文化”“血缘文化”已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因，且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中国传统文化中也积淀了深厚的传统家庭美德内容。历史割不断也不能割断，我们今天建设现代中国，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文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务，在建设思路上都决不能忽略或离开家庭建设这个重

要基点和维度。

治理理论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相对来说，传统政府管理是自上而下线性运作，现代治理更强调社会各主体、各因素在互动中实现治理。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习近平强调，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有独特优势，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十八大以来，国家顶层一再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实际上就是强调多元主体共治的理念。国家提出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对传统治理方式和治理理论的超越和发展。现代治理体系不同于传统管理—服从的二分模式，它强调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因素多维互动。除了政府、市场机制外，还应有第三方社会组织力量。现在人们讲社会治理主体多强调这三个因素，其实还应有公民个体的主体性力量和家庭的社会治理资源。尤其是对具有家国同构历史发展阶段的以家文化为特色的中国社会治理来说，更不能忽略家庭建设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或基本单元，家庭是每个人的基本生活场所，家风家教和家庭建设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功能是多面的，也是重要的。“天下之本在家”，这种判断对于中国人、中国社会来讲尤其如此。家庭建设是关乎我们每个人生活幸福的基础因素，是关乎人口生产、人才培育成长的关键场所，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也是关乎国家建设、民族兴盛、社会文明和谐的基础工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浓重的“家文化”。家庭建设在新时期、新时代也一直得到重视，20世纪50年代，国家（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就组织开展了评选“五好家庭”活动，在全社会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新风尚。至20世纪90年代，“五好家庭”进一步明确为“五好文明家庭”，评选标准与时俱进。但无论名称和标准如何改变，重视家庭

建设，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中国社会文明发展以及对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进一步自觉，家庭建设越来越多地被提上国家顶层的议事日程。

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主题就是“家庭建设”。习近平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要发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2016年中央文明委发布了《关于深化家庭文明建设的意见》，并组织了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评选活动。《关于深化家庭文明建设的意见》要求全社会要充分认识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以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为着力点，推动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接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又强调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提出要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中国的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离不开家庭建设这个本源基点，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家”，“不齊其家者，无以治其國”。

家庭在中华文明发展中更有独特的地位。中国因此形成了浓厚的以“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但事实上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家庭便作为社会基本细胞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应该说，依赖家庭生活，重视家庭建设，是人类共同的生活方式和追求。“国际家庭日”的建立，表明家庭建设的重要性也已成为世界共识。

“国际家庭日”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这个时期全世界普遍面临一些问题：家庭规模日趋缩小，离婚率普遍上升，“老有所养”问题已成世界性难题，人们的家庭观念也在普遍发生变化，等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1989年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1994年为“国际家庭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Family），并确定其主题为“家庭：变化世界中的动力与责任”。“国际家庭年”的宗旨是提高各国政府和公众对家庭问题的重视，也呼吁全世界共同关注家庭建设。之后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又在1993年做出决定，从1994年起每年5月15日为“国际家庭日”（International Day of Families）。“国际家庭日”设立二十多年来（见表1-1），在提高人们普遍认识，促进各国政府制定与家庭有关的政策，推动家庭健康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表 1-1 国际家庭日历年主题^①

2017 年：家庭、教育和福祉
2016 年：家庭、健康生活和可持续发展
2015 年：男人说了算？当代家庭中的性别平等和儿童权利
2014 年：家庭事关发展目标的实现；国际家庭年二十周年
2013 年：推进社会融合和代际团结
2012 年：工作与家庭——两者兼顾
2011 年：面对家庭贫困和社会排斥
2010 年：移民对世界各地家庭的影响
2009 年：母亲和家庭：变化世界中的挑战
2008 年：父亲与家庭：责任和挑战
2007 年：家庭与残疾人
2006 年：变化中的家庭：机遇与挑战
2005 年：艾滋病毒/艾滋病与家庭福祉
2004 年：国际家庭年十周年：一个行动框架
2003 年：筹备 2004 年国际家庭年十周年纪念活动
2002 年：家庭和老龄化：机遇与挑战
2001 年：家庭和志愿者：建设社会凝聚力
2000 年：家庭：发展的推动者和受益者
1999 年：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家庭
1998 年：家庭：人权的教育者和提供者
1997 年：在伙伴关系基础上的家庭建设
1996 年：家庭：贫穷和无家可归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1995 年：家庭：变化世界中的动力与责任
1994 年：家庭：变化世界中的动力与责任

从“国际家庭年”“国际家庭日”的建立，可见从东方家庭到西方家庭都有一些亘古不变的普遍的价值内容和意义。但东方尤其是中国，家庭更具有不同于西方生活和文化的独特价值、意义。

二、历史方位：“家”在中国历史及传统文化中的特有地位

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发展演化的结果。^②

^① 见每年的“国际家庭日”活动新闻报道。

^② 见习近平 2014 年 2 月 17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理解和解决中国问题及其发展，治理中国和建设中国，思路必须从对中国特有的“家”的历史、文化及中国人“家”情结的民族心态的认知开始。“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抓家庭建设，首先必须解决思想认知自觉问题。家庭、家族、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国获得了独特地位和价值取向，这与中国走过的独特社会历史道路分不开，与中国特有的血缘根基、历史、传统文化分不开。在今天，我们强调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家庭建设就是多维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维。我们今天建设和谐中国、幸福中国、现代中国，思路决不能忽略或离开家庭建设这个重要基点和视域。

（一）中国传统家庭模式及血缘社会根基

血缘关系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历史起点，血缘氏族的彻底解体与历史性地保存，使中西方走了两条不同的文明之路。而这一历史性的分界，终使“血缘关系”成为中国特有的以家庭为核心基础的“家”文化的逻辑起点。中国固有的这一同步于历史的逻辑起点，造就了中国传统独特的血缘宗法社会，以及与此相应的一整套宗法制度和以血缘人伦为基础的“家”文化传统。中国儒家传统“修齐治平”的德性思想，就是站在维护治理传统血缘社会的立场上，对古代中国“亚细亚”的宗法社会存在所做的一种历史性总结。历史造就了儒家的德性思想，因而历史最终又选择了儒家，致使儒家的“家文化”得以历史地延续，并成为影响整个中国文化、历史进程的思想元点。

中西传统家庭模式和文化的差异，根植于中西方不同的历史发展模式。许多著名经典作家在论及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时，都认为中西方走了两条不同的历史道路，即以西方古希腊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和以古代东方国家为代表的“亚细亚的古代”。简单地说，“古典的古代”的发展道路是从氏族到私产再到国家，个体私有制冲破了氏族组织，城邦国家代替了氏族；“亚细亚的古代”则是在没有摧毁原始氏族组织的情况下，直接进入奴隶制国家，血缘氏族制同国家的组织形式相结合。进一步说，“亚细亚的古代”形式的特点是基本不存在个人所有，土地以公有制为主，宗法血缘关系非常强。“古典的古代”的形式特点是国家所有和私人所有并列，宗法血缘关系相对淡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谈到城邦国家和氏族制度的区别，指出国家“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而氏族制度的基础是血缘关系。^①对此，梁漱溟先生曾做过专门分析，他认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94。

在中西方社会结构中家庭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有很大不同。简单讲，西方社会往往以个体为中心，家庭地位和功能相对次要，而中国传统社会往往以家庭为中心，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或细胞。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分析中西方社会结构时说，西方社会结构是像田里柴捆一样的个体集合体，而中国社会“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的‘差序格局’，这和西方的‘团体格局’大不相同”^①。在“差序格局”中，社会由不同个体按亲疏关系组成网状关系，是放大的“家”。对此侯外庐先生曾分析：“古典的古代”是从家庭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作“社稷”。^②西方人的“country”在中文叫作“国家”，实缘于指称家族的血缘关系和国家的政治关系一体化的宗法性社会政治组织，国家政治体制中带有浓厚的氏族遗制，使得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文化精神、历史进程获得了极大的特殊性。

（二）家国同构格局中的“家国文化”取向

中国传统社会属于“家国同构”的社会历史模式。这是中国特有的历史模式。“亚细亚”历史道路表明，古代中国所处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土地公有制，以及低下生产力所必须依赖的社会组织形式，使得国家公共职能在没有完全分化解体的氏族组织基础上产生。由此，国家的社会结构自然就落在了天然的血缘组织上。在一般意义上，氏族血缘组织同国家政治经济组织是完全不同的，氏族制度同国家制度也存在本质区别。

“家国同构”的社会历史模式在政治理念上往往是把“国”当作“家”来治理的，而在家庭观念中则是把治家和治国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看待的。儒家文化就是感悟到了当时中国社会关系的血缘宗法性质，看到了忠孝德治对于国家秩序稳定的重要性，把“齐家”与“治国”提到同等地位。鲁哀公问孔子：“敢问为政如何？”孔子答：“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周易·家人》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大学》也说：“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中国传统文化是把孝亲、尊祖等家庭伦理扩展至国家治理，他们认为如同以孝道伦理维护宗族一样也应以忠孝伦理治理国家。在他们眼中，孝道是维系整个社会

^①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5.

^② 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11.

秩序的支柱。而孝道是源于天然血亲之爱，爱亲之情，仁爱之心天生就有，人性本善，人道天生。人道即是天道在人世社会的体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礼记·丧服小记》）。仁爱既是人道之大，又是天道具相。在逻辑上，得天道者必践“亲亲”“尊尊”孝忠之道，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了。

（三）“家”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与西方文化或其他民族文化相比，中国人的心灵家园不似西方文化，是把精神家园置于宗教信仰中。中国文化有一种独特现象，即没有自生出严格意义上的典型的高级形态宗教。这种现象不得不引发我们思考，为什么作为人类普遍历史文化模式的宗教没有在中国产生出来。中国文化有其独特的系统和特质，这个问题同许多问题一样，只能在中国历史和文化整体的内在结构中寻找原因。原因多维，但中国血缘宗法伦理实践和家文化传统，是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宗教信仰地位和走向的根源性原因。

探讨典型宗教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不能不考察华夏民族的祖先崇拜文化。人类自发的宗教和对超然力量的崇拜分不开。应当说，“大自然崇拜”是人类早期比较普遍的一种崇拜。原始人感觉到自然界有一种异己的强大力量，便把它作为一种神秘力量加以崇拜。除大自然崇拜外，原始人还存在着“灵魂崇拜”和“祖先崇拜”。对于中国古代民族来说，祖先崇拜是最重要的崇拜，这和中国古代特有的血缘宗法社会根基相联系。宗族首领作为智慧、能力、德性方面出色的长辈，生前给部族带来繁荣和强大，人们当然幻想祖先去世后不死的灵魂仍会在暗中保佑自己的部落和子孙后代，所以那些有德有功的祖先就从先祖中突显出来，被称为“祖宗”而成为崇拜对象。西方文化在彼岸神灵的天国寻找灵魂寄托，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家”以及家国就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永远的情结所在。

正是由于家庭在中国社会中有着独特的政治、文化地位，是独特的精神寄托之处所，“家”概念对于中国人而言有了极特殊的含义，没有哪一个民族的“家”文化，能够像在中国文化中这样凸显和丰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对家的依恋能够像中国人这样强烈。在中国家文化观念中，“家”的地位和意义超越着个体，在人生中甚至具有“根”的意义。“家”就是那个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世代相传的“生根”的地方，是可以永远依赖和寄托我们身体和心灵的居所。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人生道路上如果没有一个“家”，在精神上就会永远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中。正因为如此，“乡愁”成为中国文学中一个亘古常新的浓厚的主题。

席慕蓉的《乡愁》说：“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对家乡的眷恋

可以说是人类共同而永恒的情感，但尤以中国人的乡愁心理为浓烈，远离故乡的游子无论在何处，老了之后总希望能落叶归根。余光中的《乡愁》说：“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艾青的《我爱这土地》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城市化进程、人口流动成为常态，但乡愁之情仍弥漫在中国人的心头。打工诗人郑小琼也写“乡愁”：“夜晚的乡愁添加着我们的记忆……它在我的身体里安置了故乡的灯火。”中国人注重过春节，在外媒报道中，春运已不叫春运，而叫“地球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春节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回家”。春节回家是每个在外工作、学习的中国人一年中最大的期盼。这就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乡愁就是这样浓。家或家乡已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永远的“情结”。

中国形成了以“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形成了特有的社会治理理念。在中国，“百善孝为先”“家和万事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历史实践的经验总结，更是中国独特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所导致的文化特征的一种显现。当下中国文明建设和现代治理进程中，国家顶层以及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家庭建设的重要性，根源即在于此。

三、中国传统家庭模式及现代家庭应有功能

上述可见，在中国“家国同构”传统社会中，社会治理与社会和谐是建立在修身齐家基础之上的。历史是割不断的，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发展模式中，我们也必须十分重视家庭的独特社会地位和独特功能。一种模式和文化成为传统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家”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是一个基本的元点单位，除了生存归属单位外，它还是教育单位、秩序单位、独特的社会保障单位，当人生旅途中遭遇失利和风险时，家就会成为人们最好的避风救险的港湾。

（一）家的归属感功能与和谐幸福家庭

人是社会性情感动物，有归属感需求。人们说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不同的一点即社会人际的“碎片化”“原子化”，伴随现代化的个体化、碎片化社会状况会有各种焦虑（压力大、不安全感、无意义感、孤独感、身份焦虑）。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结果之一，即后单位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作为市场中的原子——个体都凭一张自己的身份证获得市场经济社会的流动资格，每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身份自由，

但却产生了新的焦虑。市场经济把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打通了，人们可以走得更远，选择更多，但也可能因为被迫选择而不适应，远离自己熟悉和依赖的社会归属（家庭、家乡、国家），许多人也可能会产生不安和焦虑。

社会归属或生活共同体可表现为国家、民族，也可以表现为某种社会组织，某种事业、文化共同体，还可以表现为社区或家庭。每一个体都生活在一个或多个社会共同体中。置身于一定的共同体中，个体会因为与他人以及群体有共同的感受、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组织归属，而产生出强大的力量感和依赖感。在诸多现代性心灵困惑和心理危机中，用家庭建设解决心理孤独和归属感承载问题，是一个必须重视的治理、建设思路。市场大潮中，无论在哪，有家就有心灵归宿，就会心有所定。习近平接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也强调了这一点：“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

家庭幸福指数之一即“老有所养”。习近平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以家庭为主题的讲话，强调要“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中国传统形成的大家庭模式及其文化，使老年人生活在亲子家庭中，这对养老问题无论在物质生活还是在亲情关爱方面都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把家庭和谐作为社会和谐的基础，把家庭成员之间的义务和责任建立在亲情仁爱的基础上，这是中国特色也是中国家庭文化传统中积极的因素。西方家庭模式相对而言更强调个体独立性，西方社会学家马克·赫特尔在《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中，谈到西方社会老人赡养问题时指出，西方社会“老年人处境每况愈下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个体化核心家庭权利的扩大”。以至于一些西方社会学家把中国这种传统的家庭双向扶养模式，当作单向扶养模式的西方社会的一种有价值的参照。

中国共产党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执政目标就是要增进人民的福祉，让人民过“好日子”，但这个执政目标须要落实在千千万万的家庭幸福上。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为人民幸福谋利益就是这一执政承诺的具体化。习近平接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强调：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所以，幸福中国与幸福家庭息息相关，家庭建设很重要。

（二）家庭教育功能以及家风家教建设

家是人生的起点，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庭建设还直接关系家庭教育，关系下一代的成长问题。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教问